

# 深情怀念印度尼西亚(中)

由于路费不足，几经周折，我才得以免费乘“光华”轮回国。

可以说，在苏加诺时代，是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友谊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世界反帝反殖的斗争中，两国相互支持，从1955年万隆会议到1963年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印两国在不结盟运动中发挥出重大的作用，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我回国的1965年7月，我的妈妈已经60岁，本来说好第二年她和二姐启程回国，我会在广州接待他们。可是，1965年的九卅事变，风云突变，印尼反华势力上台，中印断交，我和家人的联系也被迫中断。1981年我妈妈去世，我也不能去奔丧，直到中印复交后，1993年我去印尼探亲，才能在雅加达芝灵津骨灰堂在妈妈的骨灰盒遗像前献上一束鲜花，令我悲痛不已。我的二姐也已远嫁台湾，我的许多侄儿、外甥除早年学过少许中文的以外，大都不懂中文，在印尼学校读书，印尼文倒是呱呱叫，比我们那一代人强多了。大姐的最小的女儿读到大学毕业，拿了学士学位。但是他们只能用法语与我交流。60多岁的外甥，倒是可以运用拼音标注通过卡拉OK，唱出中文音调的流行歌曲。

我回到山口洋，



夏明自选集封面

当时还不敢久留，亲戚基本上都移居到雅加达去了，我就到老同学家里，住一晚换一个地方，生怕我因为来自中国大陆，给留宿地带来麻烦。因为经过1965年的排华骚乱，大家还心有余悸。2003年我第二次到印尼探亲，虽然经过1998年5月骚乱，但中印之间的关系已逐渐好转。我到孟加影去看望老同事老同学，也参观了当地的印、中、英三语学校。我参加老同学的旅行团到巴厘岛游玩，美丽的巴厘岛让我流连忘返，在海神庙前留下许多特写照片。在印尼生活了20多年，我除了在西加各地走走，只到过雅加达、茂物和万隆，印尼的许多地方我实在缺乏了解。我还参加了山口洋乡亲、孟加影乡亲的聚会，看到了老同学们都融入当地社

会，生活有了显著好转，有些还相当富裕，也看到有些乡亲事业有成，成为大企业家，对发展印尼经济做出巨大贡献。更有甚者，有些乡亲，学有所成，参政议政，当了市长、副省长……2013年我再次到印尼探亲，可以凭护照落地签证，在入境处处可以看到醒目的中文标识：签证、付费、行李提取……。看到外甥侄儿们的生活也大改善，到本哲的别墅住几天，享受印尼的各种美食，找回童年舌尖的感觉，十分留恋。那一年，我还参观了《国际日报》大厦，见到了多位神交多年的文友，看到华文报纸蓬勃发展，华文教育遍地开花，感到印尼社会回归开放包容的新时代，中印友好事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很是高兴。

我十年一趟的到印尼探亲，1993年，我的发小好友管天来（在新华学校创作长诗《华侨大合唱》并谱曲、指挥，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5周年在雅加达中华篮球总会球场成功演出的管天来），在新巴刹的酒楼邀了原山口洋南华中学校长谢鹤庭及我的恩



Senapelan, Pekanbaru, Riau等地唐人街的新年庆典

师张石松、邦夏、孟加影的老同事等为我洗尘；原我在雅加达打石巷打工的药行老板周崇辉先生也在红溪餐馆请我吃饭；原侨总办事处的老同事在郑亚珠的召集下，在原玉融公会总干事古文珍家里开派对欢迎我和从澳洲归来在老同事温铁庆重访雅加达。我在原南华中学同班毕业的五、六位同学会在刘雪珠或张瑞兰家里聚餐，尽兴的畅谈。三年探亲的行程都留下许多照片。每每我翻看那些老照片，都会引起无限的激动和甜蜜的回忆。2003年我回到山口洋，原南华中学的老同学举行欢迎会，我在会上朗诵了诗作《山口洋，我的故乡》（后来在“坤甸日报”全文刊登），并高唱一曲《真的好想你》，几位同学住在老同学符功虎家里，买来新鲜的枝菜做凉拌菜（Lujak），还煎了许多香蕉板，尽情

享受童年时代的舌尖乐趣。

近年来，联上了微信，我与印尼的亲戚朋友及同学、同事、学生的联系更加方便快捷，即便年事已高，不方便远赴印尼，但与印尼的联系从未间断过，由于退休后，不必为工作和生计奔忙，在充裕的时间长河里，对印尼的感情、思念、牵挂反而更加强烈。拿起吉他，就想弹一曲 Bengawan Solo，打开组合音响就想听 Kroncong。在学术研讨会上结识了学习印尼文并成为高校印尼文老师的中国大西北的90后女孩，以及众多研究印尼文、研究南洋及国际关系的年轻学者，犹如遇见久别的亲人那么兴奋！感到华人华侨的历史及现状研究后继有人，令人倍受鼓舞。我的印尼情怀竟然在耄耋之年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965年与我同船回